

評論 香港 深度 讀書時間

鄧建華：在「正常化」時期閱讀哈維爾

樂觀與悲觀，都可以與結果無關。



2014年11月17日，捷克首都布拉格正舉行天鵝絨革命 25 週年紀念，前總統哈維爾的相片掛在國家博物館上，上面寫著「永遠的哈維爾」。攝：Matej Divizna/Getty Images

2023-06-09

哈維爾 讀書時間 評論

(鄧建華，勞工工作者)

一、

「當故事遭到毀滅時，有關歷史性的感情也就同樣地消失了。我記得七〇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發生了一個『歷史休止』的時期；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衝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奏和神祕，我不能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麼區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為，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就會隨之消失。」哈維爾在〈故事和極權主義〉一文中，如此形容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的捷克「正常化」時期：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捷克。「時間」被「國有化」了，「敘事」被官方壟斷。各種國家的宣傳機器，透過各種紀念日與儀式，把生活佔據。

「因為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對於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當歷史的地平線喪失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

2021年9月讀到這一段，我駭然發現，閱讀哈維爾的時空已全然不同——我正在「正常化」時期，閱讀捷克的「正常化」時期，那既不是可能的將來，也不是別國的歷史。現在打開舊版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文集，還夾附一張銀行入數紙，列出了職工盟九月初為了規避風險，預先向我支付的遣散費。

隨著時局推演，我們更加分不清楚今年和去年的分別。當2019年每個月份仍然清晰，其後的「近年」卻已漸次模糊。組織的生命消散，紀錄者煩惱於無事可記，人們沉悶於無事可做。偶然有「異見者」被黨報「金榜提名」，或者被「協助調查」，或者有組織遭到取締，一再證成城市又再「失去」了甚麼。大國之間的張力，一旦出現了二元對立化的跡象，馬上會被放大成為某種「希望」的證明，或者用來重申「希望無用」，因為都看「上面」之間有什麼動作。當然，牽涉公職人員（特別是「千萬不要google的「休班警」）的法庭新聞，也為生活平添姿彩，聊備一笑。

二、

哈維爾指出，當「勝利」的意識形態強行安插唯一的歷史解讀，主張歷史在權力之下可以預測（比如說，「由治及興」），那意識形態與不能預計的歷史發展，就必定會發生衝突。而對歷史、故事宣戰，則必定與人的生活產生衝突。於是乎，並不是人自己有意識地成為「反對派」，而是專心做事的人們自不然會被權力找上。

這一個觀點，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已經清晰論述。文中「賣菜大叔」和「宇宙膠人樂隊（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PPU)）」的例子，更是廣為流傳。哈維爾的概念分析是一回事，令我感興趣的，是他身為一個「異見者」（在引用他為異見者時，不得不加上的一對引號），在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正常化」時期，沒有故事，沒有歷史，他帶著怎樣的眼光，觀看世情？如果《七七憲章》被視為一個

民主化的轉捩點，他又是如何決定要發起運動（aka「送頭」）？

《七七憲章》運動的起源，存在於「先於政治的領域」，即1976年獨立樂團「宇宙膠人」遭到審判的案件。哈維爾認為，審判獨立音樂與一般政治打壓案件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他們不是為了反抗而組團，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音樂，他們不是典型意義下，為了反對捷共而組織起來的反對黨，而在1976年的時空，典型針對政治犯的檢控已經少了許多了。在1968年蘇軍入境後成團的「宇宙膠人」樂隊，在1970年已經遭禁，不能公開活動，一直被官方的媒體指為流氓。捷克斯洛伐克當期時的「地下音樂」，不止是「非主流」，而是與「有別於官方」的世界，其作品只能在樂迷之間流傳，也就是「第二文化」。他指出，當「宇宙膠人」遭到審判，呈現的並不是兩股政治力量之間的衝突，而是後極權體制下，「兩種不同理解生命的方式」之間的衝突。對獨立音樂的攻擊，形成了「對『磊落真誠生活』，以及對生命的真正目標的攻擊」，而且，這促成了許多人的共鳴。



2018年8月12日，捷克共和國布拉格，獨立樂團「宇宙膠人」出席成立 50 週年的音樂會。攝：Michaela Rihova/CTK via AP/達志影像

在《無權勢者的權力》中，作者好像在隔岸觀火，見到審訊引起了民情，《七七憲章》就成了隊型。文中沒有提到的卻是，正是哈維爾發起了聲援「宇宙膠人」樂隊的請願書，慢慢引起了外媒的注意，再引發國內各階層的討論。正當政府以為這宗案件會像成千上萬的刑事案件一樣行禮如儀，卻被殺了一個措手不

及。審訊案件的法庭擠滿聲援者，從「隱蔽空間」走出來的個體戶，在現實的空間聚頭，「磊落真誠」的靈魂看見彼此，刺穿了陰鬱的空氣，成為了漫長無故事生活中的一件事，才形成了《七七憲章》的氣氛。

哈維爾不僅是從現象上觀察到審判獨立音樂與一般政治打壓案件在性質上的分別，而是從中判斷到一種小眾的民情，並為之而行動。他與聯署發起人覺得「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種力量消亡，而應該把它轉化為持久的力量，把無形轉化為具體。」於是決定以《七七憲章》的形式，將這種力量變得可見。

就在宇宙膠人樂隊被捕前大約一個月，哈維爾得朋友介紹，拜會了以這樂隊為核心的「地下組織」，與當中的藝術監督伊勞斯 Ivan Jirous長談了一個通宵。伊勞斯是當時捷克地下音樂界的重要人物，在70至80年代，先後入獄五次，共計8年半的刑期。這次會面，被視為捷克「知名異見者」與地下音樂界翹楚的對話，也是被禁劇作家和音樂人之間的交流。哈維爾在他們當中，見到了自己主張的「獨立的社會生活」：「伊勞斯的這個地下組織就是企圖給那些遭受排擠孤立的人一個希望。」據一度是樂隊成員，並把哈維爾獄中書和自傳譯成英文的Paul Wilson所講，《無權勢者的力量》中「第二文化」和「活得磊落真誠」的概念，都源自於伊勞斯。

「第二文化」、「獨立的社會生活」、「活得磊落真誠」，這些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之中出的出現的主張，並不是一股「異見」政治勢力。而是哈維爾與伊勞斯的交流、是哈維爾成為被禁作家之後，仍然會相見的作家圈子，是還願意演出哈維爾劇目的劇組。是在漫長壓抑的社會中，觀察到的點點人性。

哈維爾將他這些觀察，歸納為對「下面」的觀察。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向來都是對『下面』所發生的一切更感興趣，對寄於『下面』的期望、對那裡所能贏得的和所能保護的更感興趣。所有的權力都有支配的物件並總是要不知不覺地而不是故意地對其支配的物件的精神和行為做出反應。你總會發現當權者的行為中總會反映出『下面』的情況。沒有人能在真空中進行統治。權力的行使總是取決於有權界和無權界之間的相互作用，由於雙方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每個人都既有權力又無權力，所以就更是如此了。」

三、

捷克踏入「正常化」之後，哈維爾很快就被官方的作家協會開除，自然也被扣帽子，成為被禁作家。也就是他說的「歷史休止」時期。在這段日子，他遭到官方點名攻擊，同時繼續創作，當然，此時他已經「不小心」由一個劇作家變成一個「東歐異見者」。





1968年8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蘇聯坦克在街道上排行。攝：Bettmann/Getty Images

他對於「異見者」的標籤很是敏感，他寫道：「當西方人談及他們的時候，多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有犧牲精神的人，又或者在其著作中有著批判性或政治性的內容，而非因為他們在自己的領域內『實際上』做了些甚麼。從我個人的經驗知道，事實上存在一條無形的分界線，你自己未必願意，也未必察覺到，但只要你超過了這條線，他們便不會視你為一個碰巧也關心世事的作家，反而是一個偶然碰巧（大抵在餘暇時）才會寫劇本的『異見者』。」

「異見者」的區分，「漠視了這類活動內在的道德性質」，甚至吊詭地與「其他人」區分開來。強調「異見者」與政權的對立，恰巧反襯了「異見者」能人所不能，外顯的「道德勇氣」卻掩藏了其內在實際的內涵。

在自傳中，他更為直白：「我承認我偶爾也想大聲疾呼：我已厭倦了作一個先行者，只想做一個作家該做的，我只想說真話！不要再期望有專人為你提供希望了，從自己身上找到希望吧！自己去承擔風險吧，我不是救星！」不過他始終沒有這樣大叫。因為他的老友，《七七憲章》的發言人帕托切卡總是提醒他：「考驗一個人，並不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他自己給自己所認定的角色，而在於他是否成功地扮演了命運交給他的角色。」

他拒絕「異見者」作為一種「專職」的定義，也拒絕為自己的主張定下綱領。在早年，他曾經自視為社會主義者，也一度主張建立反對黨，認為應該以達成政治更替為目標。然而，隨著他思想的成熟，他更著重的，是回歸到人的政治。羅永生指出：「哈維爾所追求的，是一種能切合現時代人類處境實況的真正激進路線。他認為這只能在一種外於政治（non-political）的領域中追尋。」。在自傳中，哈維爾一再談到，

他認為建黨沒有用、與意識形態爭論誰對誰錯沒有用（也許是諸如當前階級狀況之類的定性問題）、綱領（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也沒有用：「先有一個使世界更美好的想法，然後再付諸實施的思想是不正確的，相反的，只有通過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經歷才能創造那種辦法並將其表達出來——從現存的『這個世界的題材』去創造它，用『這個世界的語言』明白無誤地表達它。」由於他的主張很難（又很容易）被冷戰話語所框限，他寧可用些暫創的新詞，例如「後民主」、「後極權」來暫時指稱他所提到的概念。

他甚至認為，自己關注的不僅僅是捷克、東歐在蘇共治下的「極權」問題，而是人面對專制時的「人性」問題，是具有普遍性的課題。崔衛平評說，哈維爾的視角從來是全球語境的。對哈維爾的理解不能單單框限在「蘇共治下的異見者」。身為一個劇作家，他關注的從來是人的存在的普遍性問題，而其「東歐經驗」只是現代社會中，人存活要面對的其中一個側面。他不斷提醒，西方資本主義之下產生的人性問題，既不能說比東方簡單，也不能自外於東方。簡言之，人性的問題，是一體的。

四、

在談論「異見者」、「反對派」這些概念時，哈維爾經常會以「回應外國人」的方式展開。我想，他在其回應中努力想表達的，並非要針對西方人（雖然其實相當尖銳），而是要指出他從「下面」觀察到那些「無濟於事」但又非常重要的物事。專注於「下面」，並非等於哈維爾見不到「上面」所發生的事，只是他對「下面」更有興趣。因為那是民眾自我覺醒之所在。而「異見者」的框限，正正掩蓋了種種「下面」的可能性。





2014年11月17日，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名男孩在天鵝絨革命 25 週年紀念日點燃蠟燭，以紀念 1989 年遭到防暴警察襲擊的學生。
攝：Matej Divizna/Getty Images

由此，他提出了有別於很多人的想像，即權力的鬆動不一定首先來自上層權力的變化。相反，制度改變之前，社會已經漸漸出現了未顯見的根本變化。若只關注官方話語，或者「失去」了什麼，使會錯失閱讀這些根本變化的機會。

哈維爾很避免書寫自己的獄中生活，因為他覺得怎樣寫都不準確。大概他會覺得，如果寫得慘絕人寰或者內心平靜，都會被誤傳為東歐異見者中的殉道人或者道行極高的修行人。可是他卻又寫說，在最沒有事情發生的監獄，每一個囚友都有獨一無二的故事。這真可說是他觀看「下面」的最佳註腳。極權社會下千人一面的順從面貌，反而不在監獄之中。

「不管我怎樣認為我的獄友們豐富多彩的敘述，他們反正不是極權主義虛無化的文獻。相反地，他們證明了這種叛逆：獨特的人性用叛逆來抵抗它自身的虛無化，並且用自身具有的頑強精神以無視於這種消極性的壓力。」

他關心的始終是每一個人的故事，如何在侷限中展現出來，也就是人性與權力之間最基本的角力。

五、

當我讀到哈維爾在自傳中回憶布拉格之春與其後蘇軍入侵的描述，我腦海中自然閃現出2019的民眾自發抵抗。那些啟發性哪怕是曇花一現，卻淡然而永存。哈維爾這樣寫道：「突然間，你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人們可以自由地來往，恐懼感消失了，禁忌被掃除了，人們可以公開地說出和討論社會衝突，表達各種興趣，大眾傳播媒介又開始做其應該做的工作了，公民的自信心開始增強。一句話，冰雪開始融化，窗子開始打開了。很難不為這一切所吸引和打動。」

在利貝雷茨（Liberec），「反對佔領的人們在這裡組成了一道人的屏障。為了挫敗蘇聯佔領，人們想出了無數的辦法，辦事效率從未像那時那麼高。印刷廠兩天就能印出一本書，所有的企業幾乎都能立即辦成所有的事情。」一群平時被官員視為治安剋星的「青年暴徒」，在一夜之間拆除了利貝雷茨的路標，以阻止蘇軍的推進。



1989年，天鵝絨革命期間，捷克斯洛伐克市民湧入布拉格街頭。攝：Peter Turnley/Corbis/VCG via Getty Images

他引述並同意一位著名記者佩勞特卡的觀點：「『布拉格之春』期間那些小的社會單位所表現出堅韌不拔的反抗精神，比起那些聳人聽聞的政治揭露對於未來要重要得多。」無論結果如何，這些自發性的高度，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但反抗精神也不是由真空中出現的，在1968年之前的八年，哈維爾一直在一間劇院工作，在這段日子成為了一個戲劇家，也與奧爾嘉成婚和共同工作。「非意識形態藝術」在這段期間興趣，在劇界是「小劇場運動」，在其他領域，也充滿著以不跟隨官方自居的藝術家。「這些小劇院以自己的方式反映所有促使創作為生的力量，是理性和精神發展過程的重要指標與中介之一。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開始意識到自身，解放自身；這個過程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九六八年的政治變化。」

早在共產黨改革派發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改革」之前，「偏離」意識形態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已經自然發展，「下面」的人們此起彼落地，用不同方式思索國家的未來——而當時領導改革的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的行動，則「只」是一切發展的結果之一——而這聽起來，又是多麼「熟悉」。

如果我們用這個觀點來回想2019年，會想起無數個表現出反抗精神的「小社會單位」，那種氣氛與兩傘後到2019之間的沉鬱形成強烈對比，民眾自發性的高度，化解了政客或者既有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的政治觀

點，用新的方式達成共識和行動。（當然，也會產生新的衝突。）這一切既不是在真空中出現，也或者已經過去。但曾經達成的啟發，是不會消失的。

六、 《故事和極權主義》中有這麼一段，時為1987年：

「故事和歷史抵制虛無化的鬥爭，正是它自身之內的一個故事，並且屬於歷史。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要如何去講述它，因為傳統的講故事的形式在這裡對我們不適用。我們也不知道支配我們的變形故事的法則。我們甚至不知道誰或什麼東西是故事的主要或反面人物（這肯定不是那權力中心之內的少數人：他們也是某種更大的東西的犧牲品，就像我們）。」

通過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哪些故事是被定義的，哪些是由人們自己譜寫的。

比如說，「失去了三八、五一遊行」，是被權力定義的，但是「工會入紙申請遊行」，儘管結局是寫在牆上，也是由他們親手寫上的。這便是人的能動性所在。



2019年5月1日，香港勞動節，數百名工人走上街頭，高舉著標語牌和橫幅，要求改善工人的權利。攝：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Vulliamy